

赵天益散文阅读札记

〔序一〕

◇李光武

这些年来,天益同志一直是我最为关注的当代散文家之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为其散文创作写一点评论文字,可谓夙愿已久。近日重读天益同志的四本散文集,不读还好,一读夜不成眠,感叹不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转眼又一个十年流走了。十年中,我目睹了中国散文的“世纪末的狂欢”,也让我目睹了一个作家在中国西部的迅速崛起,目睹了一个人的“生命的花朵,突然间竞相怒放,一发而不可收”(作家高兴语)的壮丽景象,目睹了一个人由中年迅疾而缓慢地步入老年的全过程——这个人就是我的老领导赵天益。这些年来,我和读者一样是在天益同志的散文的轰炸中度过的。他的作品数量之大,创作速度之惊人,艺术起点之高,写作状态之轻松,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天益同志在散文界的崛起确乎是个奇迹,在党政干部中极为罕见。这一文学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一个看似偶然的现象它的必然性是什么?赵天益散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

解读这一现象和解读天益同志四大本散文一样,并非易事。它至少牵涉到这样几个问题:全球化时代与本土化写作、仕途与文学谁更有价值、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不断重复的人生轨迹:出世与入世和心灵的最后回归。

启示之一：怎样看官员写作或“官员文学”。“官员文学”一词是我杜撰的。这是天益同志散文创作所昭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古老命题。为官者为文，自古有之。科举取士，以文量才，各级官员一般都是文人出仕，政务之余，多有诗文，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这支素质卓异、人数众多的作家队伍，几乎包揽了中国古代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家，包括书法家。许多大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有名作传世的诗人、散文家，如：曹操、诸葛亮、范仲淹等等。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官员文学”。“官员文学”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当然，未出仕的文人和人民群众在古典小说、民歌、民间文学等各领域也为古典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官员写作与平民写作之间最大的区别，大体上是多以有为的儒家思想入世，以无为的道家思想出世，以政治梦开始，以文学梦告终，如此而已。一种是“大我”写作，一种是“小我”写作，一种是英雄主义的慷慨悲歌，一种是个人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大树无风而鸣，是为天地而鸣；小草有风则偃，是为一己而偃。屈子之吟，为一国而忧；东施效颦，为一己而愁。一个政治家为诗为文和一个书斋里的冬烘先生为诗为文是有天壤之别的。官有官道，文有文道，政坛与文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游戏规则、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截然相反。在两种道、两个世界之间能够自由出入、独领风骚的毕竟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人物。而更多的中国文人只能终生在一个世界里行走，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另一个世界你是永远走不进去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和李白，二人均有出将入相之志，终生困厄，最终又都是投水而死，归于虚无。中国文人一直把仕途当做终南捷径，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杜甫在《旅夜书怀》中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诗句，他们似乎对自己因文而名不以为然，愤愤不平，在他看来，因官而名才是正路。这种观念也

使许多文人误入了官场。而误入政坛丢了脑袋的也大有人在,如书法上著名的瘦金体创立者宋徽宗赵佶,一代大诗人南唐后主李煜等等。所以说,一切矢志于文学的人,大可不必去从政;而一切有志于从政的人,还是要懂点文,也大可不必等待戈多。何必像躲瘟疫一样躲避文学呢?大家应该学习范仲淹。须知,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重视文事和文人阶层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官的不写东西,更怕沾上文学的边,怕伯乐们把我们的政治家们划到“书呆子”那里去,似乎胸无点墨才容易被委以重任,根本问题是怕影响了个人的政治前途。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宦海生涯与艺术人生是两种活法,乌纱帽前无数英雄竞折腰。如果天益同志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有追求、有境界的人,又何必五十从文、用生命去写作呢?那个作家的桂冠又值几何?从政一生,最后十年以文学名世,此中人生真谛和洒脱,又岂是一般世俗之人所能理解了的?世上的官员千千万,而散文家赵天益只有一个。在这个健忘、分化、颠覆的年代里,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大地已经记住了你的名字!一切物质的产品和美丽的光环都将黯淡,而精神的财富永恒。

启示之二:本土化写作。天益同志的散文创作走的是一条本土化写作的路子,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传统、美学追求和民族精神。这一突出的特点是他区别于年轻一代的散文家的重要标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结构古汉语材料的能力,诗性的美学追求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都是青年作家无法相比的,这也是他本土化写作的前提。这种自觉健承、创新和坚守,是非常宝贵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和作品充斥着我

们的文坛。贩卖西方进口的“理论”，仿制“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成了某些人的成名成家的不二法门。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必须走本土化的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以我为主，以彼为辅，在融合中创新发展。扔掉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全盘西化”的路在中国走不通。

启示之三：母语写作。天益散文创作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也是一种哲学。语言是文学的最后归宿。许多作家失败就败在语言材料上。用诗一样语言写散文，才是美文。语言能照亮一切。读天益的散文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语言才能。他的散文的诗性的美学特征主要得益于语言。他用语言作画，是一位水墨丹青的高手，观察细微，视角开阔，对色彩和点线十分敏感，状物抒情，酣畅淋漓，古雅而清新。他写威风锣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还有对味觉的描写等等。这是作者把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通感”手法引入散文创作的结果，产生了色、味、声、动和质感的艺术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和艺术张力。天益同志散文的语言来源主要是古典文学语言，其次是现代以来的白话文文学语言，并进行了一些搭配和组合，赋予新意，形成了典雅、凝练、流畅、清丽的语言风格。天益散文的语言特色，表明了一个真理：一切使用母语写作的大作家，都必须是本民族文学语言的巨匠。

启示之四：浪漫情怀与酒神式的情感。这是作家必备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当不了作家。风格即人，作品是作者的翻版。天益同志对生活的感光能力很强，有一颗虔诚、热爱、沉迷、悲悯、梦幻和敏感多思的诗心。夜深人静读天益同志的散文《母亲》、《过年》、《绿色奏鸣曲》、《野艾赋》、《威风锣鼓令人醉》等写故乡、

写童年、写母亲的佳作，不禁潸然泪下，伤感不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类作品。天益同志写得最好的是他的游记，如《东汉帝陵柏森森》、《东林听鸟》、《诗情画意读匡庐》等代表作，可谓散文中的上品、珍品，完全可以和现、当代散文大家的名篇名作相媲美。天益同志的散文取材广泛，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流动于其中的是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情怀和生命体验，这正是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根本所在。

启示之五：散文美学及美学的现代性。这是阅读天益散文引发的重要思考和启示。天益散文所流注的美学精神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受中国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美学的影响很大，此类传统的本色散文因其日见稀少而愈发有了研究价值。天益同志在其《爱洒天涯》一书后记中写道：“除把感性的物和知性的理写下来，也把一些悟性的思考掺进去。”这为我们探讨其散文美学提供了线索，而“知性”和“感性”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关键词。天益同志在一些文章中就散文之道多有体会，其中对散文美学原则颇有感悟。我观天益散文的艺术哲学大体呈现为：知性与感性、人性本质与天人合一、形而下与形而上，以及质与文、大与小、实与虚、动与静、反差与和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等等。譬如他的代表作《东林听鸟》就很典型，貌似有题似又无题，貌似闲适似又心如潮水，大中取小，小中见大，以小胜大，无限心事，尽在文章背后。“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郁达夫说的现代散文特征之一，在天益散文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东林听鸟》在天益散文中是个另类，可遇而不可求，已非人力可为，其美学价值必为后人所推重而传世。

那么，散文的大道是什么？散文到底有没有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收的美学标准和特殊规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中国的第一本散文集《尚书》到周作人的“美文”，以至当代的“南余北周”，

一言以蔽之：不过理性、感性、人性而已。从古至今，概莫能外。这里所谓的人性指人类普遍具有并认同的人的本质、价值观和审美意识。至于手法和形式不过技术和容器而已，是酒和酒瓶的关系。当然形式的某种决定性作用亦不敢低估。韩愈之所以“文起八代之衰”，恐怕也遵循的是上述原则，“古文运动”，是拨乱反正，恢复古典散文的传统和散文的本质，在继承基础上“开启千年之统”。时下的余秋雨的贡献是把中国散文的“知性”推到了极致，形成了文化散文，而周涛的贡献是把中国散文的“感性”推到了极致，提出并开创了“大散文”的新形式。

中国美学正面临着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问题。怎么转？按哪一种美学理论转？“五·四”以来，除中国古典美学以外，主要有两种美学理论在冲撞消长。一种是康德的以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为审美主体的自由主义美学，一种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以人民大众为审美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个人认为，应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逐步建立一种以全人类为审美主体的现代美学，继承中国古典美学和人类一切美学精华，以现代人类的理性、感性、人性为重要衡量标准，探求一切反映美的本质。对人类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和规律，是不是世界美学现代性的必然之路呢？而散文美学的现代性也就在其中了。

启示之六：评论要讲点科学精神。鲁迅先生当年关于文艺批评有八个字：“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天益同志的散文的评价也应该如此。我拜读了众多评论家关于天益同志散文的评论文章，也有幸参加了“赵天益作品研讨会”，总体感觉绝大多数定位不够准，缺少研究和理性剖析。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天益同志定位于业余作者，这实在是一种误读。用业余的水准去衡量作家作品，看似宽容，实在是一种污辱。衡量作家的标准只有一个：只看

作品,其次再看他的人品,官品也是人品。天益同志虽然不是从事专业创作人员,但绝非业余作者,他已由新疆走向了全国,已在中国散文界有了一席之地。对他的要求应该是对专业作家一样的标准。对天益同志散文存在的不足,人们谈得都不多。我认为天益散文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游记作品有点浮光掠影,勉强成文,只见风景不见人,缺乏艺术感染力。二是其艺术风格上的典雅、工整、端庄固然可嘉,但野性不足,缺了一点疯劲。三是天益同志的散文基本上属于传统文体,还不属于“大散文”。我曾建议他读一点周涛的大散文,选准题材,深入下去,写一点关于人物或事件的中、长篇散文,甚至在“破体”写作上试一试,如“小说化散文”的创作。“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天益同志是有潜力、有生活的,艺术上已日臻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天益同志的创作将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惊喜。

天益同志是孟津人。孟津是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盟的地方。当年诗人元好问自洛阳去孟津的途中有诗云:“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盖世功名何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

孟津真是个好地方啊!

二〇〇三年十月于李园

赵天益散文的创作优势简论

〔序二〕

◇夏冠洲

赵天益同志最近告诉我，他的新一部散文选集已编迄即将出版，我听后十分高兴。这将是他的散文创作的一次大丰收、总检阅，读者将从中获得特有的阅读快感和教益，其中的艺术经验，也会对新疆散文的创作提供诸多启发，因此值得祝贺。

据我所知，与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一样，天益同志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学学习了。但真正大量地、连续地发表作品，却只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属于起步晚、但起点却较高的那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作家类型。但是就在这短短十几年来，他一发不可收地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品，先后结集为《情醉旅程》、《爱洒天涯》和《塞上听潮》等三部别具色香的散文集问世，同时还有一部论文集《观察与思考》出版，平均每四年一部，煌煌百万余言。这些创作实绩，就是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也实属可观，何况他是一个典型的业余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担负有重要公职（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政委，继任兵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的党政“官员”。亦官亦文，在堪称“日理千机”的繁忙公务之余，挤时间写下如许之多的散文作品，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这正是我对天益同志十分感佩的地方。

天益同志的散文已为自己在新疆文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我国著名前辈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在给《情醉旅程》的题词

中指出,天益的散文“很有特色和颇有真情”;当代中国杰出作家王蒙在给《爱洒天涯》的题词中说天益散文“为大地织锦添秀,让爱心遍野开花”;作者的同乡、著名老作家李准先生在同书的题词中则称赞道:“明艳朔雪,淡雅春风”,都高度地评价了天益散文创作的成就。如果说,冯牧先生是对天益散文艺术的高度抽绎,那么王蒙同志就是对其内容的准确概括,而李准先生则对其艺术风格作了言简意赅的形象比喻。的确,天益散文的艺术特点是很突出的:生活深厚,视野开阔,观察精细,感觉敏锐,感情细腻,文思缜密,表达含蓄,文笔优美等等。其风格,我也曾试图以“优美、婉约”、“清秀俊逸”等来形容。同时天益的散文也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突破与进展。从《塞上听潮》集子中《思之篇》一辑,以及近年的新作《石河子叙事》、《凡人琐事》和《穿越塔里木》等几组系列作品来看,可以明显感到他已由原来较多的真情宣泄与客观抒写,逐渐转移为对人生哲理的沉思和内心世界的开掘;从热衷社会政治主题的揭示,进展到更多地对地域文化、个体生命意识和人的精神家园的关注,境界显得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刻,感情更加沉潜,生活的信息量更加丰富,艺术愈加成熟了。这些变化,正符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趋势。所有这些,在作者童年挚友、著名诗人王恩宇和东虹、新疆青年评论家高兴和韩子勇等人为他的几部散文集所作的序跋中,也已作了相当深入、充分而精当的论述。正因为如此,天益的散文业已走向全国。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跻身于新疆屈指可数的优秀散文家之列,成为兵团“屯垦文学”,特别是散文作家群中的一位无可争议的代表性作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就恰恰应验了王恩宇对天益同志的鼓励和预言:“钟爱文学的人定能得到文学深情的回报,丰硕的成果永远向辛勤的耕耘者微笑”。(《情醉旅程》序)

出于对天益同志散文作品的喜爱，我已先后撰写过几篇粗浅的评论。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再就天益同志作品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评论，而只想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谈一些感想。在论及天益同志散文时我曾特意说过，虽然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文、人分离”的情况，（这并不包括一些有了钱或有了权，就附庸风雅地矫情作秀，不惜雇用“枪手”捉刀炮制的一些文字垃圾；而是指如周作人这种显例的文章与人格的那种分离，以及某些本属真正的文化人，却一时屈从压力，迎合时尚而写了些违心话的现象。这是要首先说明的。）但我始终坚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的绝对合理性和普遍性。认真阅读天益的散文，同时联系天益同志的处世为人，你就会发现，两者竟是那样的表里如一，水乳交融。

我与天益同志可算得真正的文字之交。茫茫人海，我与他是如何相识而成至交的呢？这还得从两个真实的故事说起。据天益同志说，九十年代初，一位北京的老朋友来乌鲁木齐看望他，带的礼物竟是在北京书店买来的一本书：《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穿透》，这正是我的第一本评论“处女作”。他从书中既得知我也是河南人，也从文章中读到了我的真诚，所以很想同我结识；而我为天益同志写的第一篇评论，则是在从未谋面的情况下，读到他的散文集《情醉旅程》后的有感而发，更确切点说，是我被他那真情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才一口气写下九千字的评论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上；当然其中不无同为河南人的乡情包含在内。天益同志是洛阳人，我虽说是南阳人，但却出生于洛阳。也许正是这“本是同根生”，冥冥中某种神秘的力量使我们凭借文学的机缘不期而遇了，此后遂成相契。这种有趣的纯文字交往，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人生缘分。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知人论世”和“文如其人”，与西方文论

中的“传记批评”方法和“风格即人”的说法都是暗通的。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学观念在我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在我的文学评论生涯中,对作品文本的论析和对创作主体作家心灵奥秘的探究,往往齐头并进或者结合进行,是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势。由于近年来与天益同志交往密切,对他的处世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在这篇文字中,我准备由文而人,集中对他所具备的诸多散文创作优势作一初步探讨。

在我看来,天益同志的散文创作之所以起点较高,并在较短时间里,迅速跃居于兵团散文创作一流的地位,与其文学的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是分不开的。天益同志拥有哪些散文创作的优势呢?我想至少有下面四个方面。

首先,为人真诚正直,具有健康积极的人生意识,心灵纯净,充满爱心,是构成天益同志散文坚实的人格基座。

在我的印象里,慈眉善目、表里如一的天益同志是位待人处事十分真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他是一位曾经长期执掌兵团人事大权的高层官员,众所周知,处于这种地位的领导,个人品质稍有瑕疵便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天益在工作中却堪称清正廉洁,口碑极好。同时,他还有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加上他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良好的职业习惯,既培育出健康积极的人生意识,也涵养了他理解人、关爱人的优秀品质。作者曾说:“生活给予人类的,是酸甜苦辣都有,喜怒哀乐俱全。在纷繁复杂的人生历程中,我们该如何去品味人生,如何成为大自然的主宰,甚至能在生活中把各种成分的比例调配得轻松、自在、潇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塞上听潮》后记)显然,天益同志是较好地索解了这个人生重大命题的。他是个生活的成功者,无论是作领导,还是当作家。文学是人学,在现实社会中首先学会做好一个“人”,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条件。在与他

交往中,有几件事使我备受感动。一个是对著名诗人杨牧的发现和重用。那是在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极左的余毒尚十分横行,当时担任农八师一四八团政委的天益同志,偶然发现了被视有政治问题的普通农工杨牧有着突出的文艺才华,便顶着压力,力排众议,给他以大力保护和扶植,最终使得这位青年诗人从莫索湾一隅,走向全国诗坛。如果不是天益同志慧眼识珠,为杨牧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杨牧是否能在今天成就为“新边塞诗”的代表诗人就很难说了。另一件事同样体现了天益同志的正义感。由于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还有世俗的偏见,在新疆的河南人往往会受到群体歧视,有人甚至连自己的祖籍都不愿承认了。天益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多次大声疾呼:河南人怎么了?表示要尽一切力量为河南人争气争光。为此在退休后,他排除万难,群策群力,成立了一个以新疆河南籍各界人士为主的经济文化群众团体,正努力为改变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干出些实绩来。工作中、生活上的天益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真诚的人,一个充满关爱之心的人。巴金先生说,文学总源于爱。证之于天益同志的全部作品,也具有这种特点。在他那数以百万字计的散文作品里,无论是对故乡、对故人的深情追怀,对荒原上艰苦卓绝拓荒生活的自豪回忆,还是对边塞山山水水的由衷讴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珍爱,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和思索,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对人生的执著眺望与对生命意识的体验,那种真诚的品格和对生活的热爱始终一以贯之。有些个人品性存在缺陷的作家,在他良善人性占据主导地位时也能写下优秀的作品,但往往不能贯彻始终,时不时在某些环节上不自觉地暴露出某些魔性来。而在天益同志那里,人品与文品是和谐统一的。正是由于对天益同志人格精神的这一明显特征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在动笔评论他的散文时,首先映入脑海里的便是

这种意念，于是便陆续写下如出评论：《生命印痕的真情抒写》、《清秀俊逸见真情》、《为文难得是真诚》、《拳拳爱才意，殷殷敬业心》等，题目中的用语都不约而同地贯穿了这种意识。真善美是艺术品的统一体，而真实又是善与美的根基，是艺术的生命和灵魂。惟其真诚，作品才能以真实动人，才能净化人的灵魂，进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古语云：“厚德载物”，文艺其实是作家人格的呈示，是无法作秀藏拙的。正是在这里，健康积极的人生意识、正直真诚的为人，善良纯净的心灵，这些作家的内在的思想品德修养，就为天益同志的散文创作奠定了艺术坚实的支撑点，建立起稳固的人格基石。

其次，丰富而斑斓的人生阅历，为天益同志的散文创作准备了雄厚的生活积累。

仅具备正直真诚的人格精神和健康积极的人生意识并不能成就一位作家。否则，世界上作家也就太容易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的论断，无疑是句至理名言。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往往在写了一两部优秀作品之后，便陷入后劲不足的困境而“江郎才尽”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生活底子不足所致。天益同志文学起步虽晚，近20年来却愈写愈多，愈写愈好，而且“文与人俱老”，创作势头至今未见衰减之势。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丰富而斑斓的生活阅历，始能厚积而薄发。他出生在中原洛阳农家，中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边来到新疆，在准噶尔茫茫亘古荒原上，他作为最普通的团场农工，烧过荒，种过地，挖过渠，修过水库，出过大汗，流过热血，有过底层艰辛而又不乏创业欢乐的生活体验。此后他又从基层的干部干起，中经团场政委，直到升任兵团组织人事部门的主管领导职务。这期间，他也曾受到“文革”的冲击，挨过整，蒙受过委屈，坐过“冷

板凳”。人生中所谓艰难困苦、荣辱升沉等等酸甜苦辣,他都品尝过了。特别是他曾在比较繁杂的兵团高层组织人事部门主持工作,这个位置免不了要与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类型复杂的人物打交道,人群中好与坏、忠与奸,什么人他都见识过,甚至较量过。这些各个层面的生活体验,这些做人的工作经验,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和思想情绪积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这幅古联的思想虽然从曹雪芹到鲁迅都曾极力反对过,视为迂腐,但是从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上赋予新解,确也属很有参考价值的人生格言。我读天益散文往往能读出他像生活中一样的炼达和稳健,不温不火,循循善诱,如对挚友促膝谈天,如坐春风,亲切而温馨,有春雨润无声的感觉,这是很难得的阅读体验。这些,是从他人生经纬之中的时间纵向来看的。再从空间横向来看,多年来他也乘参加会议和工作考察之便,几乎走遍了长河上下,大江南北,算得上北国风光,南岛椰林,东海浪涛,昆仑雪山,港澳景观,尽收眼底。近年来他更走出国门之外,先后到过东南亚、新、马、泰,游历过俄罗斯和“独联体”诸国,也曾飞越太平洋访问过北美几个国家,饱览了异域风光。这些丰富多彩的考察旅行生涯,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思考比较的众多参照物,从而为他的散文创作补充了源源不绝的题材和灵感。现在随着富裕起来的人们外出旅游的机会多了,浮泛老套的所谓旅游观光性的文字,也随之泛滥于各地报刊之端。因此我对这类千篇一律无甚新意的文字,一般不很恭维。但翻阅天益同志大量的游记散文(几乎占了他全部作品一半的篇幅),虽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上述写作模式,篇篇皆精,但却有不少确系有真知灼见之作,继承发扬了古代游记小品的传统,精心结撰,旁征博引,能令人增长知识,耳目一新,引起悠长的思索。散文的一大艺术特征就是“散”,“海阔天空,自由驰骋”。天益同志阅历广,

时空跨度如此之大,人生角色反差如此强烈,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斑斓多彩,这就为他的散文创作准备了充足的生活库存,笔下似有着表现不完的话题、场景、思想和情绪。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我这棵小草由两方热土育成。一个是生我养我的中原大地,……一个是我安身立命的新疆大地。……由此产生的两地乡情构成我感情世界的两块坚实的基石。”(《爱洒天涯》后记)读天益同志的散文总感到他的生活底蕴十分丰厚扎实,原因盖在于此。

专注的投入精神,过人的抗干扰能力,是天益同志的第三个创作优势。

虽然王蒙曾有“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的说法,但是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的每个人并不都能够简单地成为一名作家。而且仅仅热爱生活,有敏锐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热爱文学,准备从事文学创作等条件也还远远不够。作家需要具有某些特殊的才能和资质。其中排除其他人生道路或职业的诱惑,坚定地走文学之路,具备一种为文学献身的专注精神,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年轻时喜爱文学,想走文学道路的人何止千万,但最后终于走出来并且取得一定成就者,万分之一不到。历览文艺前贤,无论中外,凡是作出突出成绩的成功者,无不具备着意志坚定,能够经受住干扰和打击,耐得住寂寞,万难不屈,专注于自己所挚爱的事业。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蒲松龄的名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就显示出这种过人的意志品质。天益同志幸运地成为这其中的“万分之一”,他终于在业余的文学道路上艰苦跋涉,走向了成功。而他之所以成功,条件之一就是这种由挚爱文学激发出来的惊人的勤奋。西方哲人说,成功就是天才加勤奋加机遇。比较起来,我更看重决定性的勤奋因素,因为一般人的智商相差无几,而“勤能补拙”。只有勤奋才能激发人的潜能,更能发现并抓住机遇。同时,只有勤奋,才能体现

出一个人抗干扰的能力和专注投入的精神。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抗干扰的专注精神可以说是天益同志最为独特的创作优势,也是令我最为折服的心理特征。如前所述,天益同志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事务纷纭,十分繁忙。我常听一些当过官的前辈文化人感叹,要搞创作就别当官,要当官就别搞创作,因为不仅精力与时间相冲突,而且两者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也大相径庭。证之文坛,这种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情况比比皆拾。例如天津市的蒋子龙,就曾为文抱怨当协主席误了他的文学创作。虽然古代有王维和王安石等诗人宰相比较成功的例子;当代也有部长作家两不误的显例,这就是“当代文坛奇才”王蒙。但毕竟属于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可是天益同志恰恰是在他调至乌鲁木齐,在兵团组织人事部门任期内才进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大写特写散文的。他是怎样合理安排自己的精力与时间呢?并且又是怎样排除繁杂事务的干扰,不断及时进行价值与思维的转换,从而进入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创作状态的呢?我常常大惑不解。不过,从他不少谈及自己日常生活的文章中,我们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在《静夜长思》一文中,他这样描写道:“又是一个静夜,一个冬天的静夜。……这十多平方米的大世界里仍暖烘烘的,最适宜在温床上泡发懒梦。我打开绿罩的台灯,夜静灯明……照亮了我的一个个夜晚,伴我读书,引领我在过去、现在、未来中跋涉,在钢笔和稿纸中打发岁月,在黑夜里寻找光明。”原来,天益同志的散文大都是在白天工作之余,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创作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回答称他为“天才”时的话:我哪里是天才啊,我不过是把别人喝茶、聊天、跳舞、打麻将的工夫都用上罢了!天益同志自然不是天才,他也是把被许多人空掷虚度的闲暇时光,都用到读书、思考和创作上罢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天益同志这么做并非是以放弃或应付

本职工作作为代价的。这与天益同志个人品质和人生意识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天益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称职的组织人事工作者。他同样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工作同样投入专注,成绩显著。截至退休之前,他始终只是把散文创作放在副业位置上,对本职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所建树。这一点,从他那部探讨政治思想和管理工作规律的论文集《观察与思考》中,就不难得到验证。也正是这一点上,他的抗干扰的能力就特别显得难能可贵。由此,不能不使我佩服天益同志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人的抗干扰能力。

第四,比较深厚的文化积淀、较高的文艺修养和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是天益同志散文创作的明显优势。

作家都有一个大量阅读的准备期。对文学的嗜好,也往往是从阅读中养成的。作家其实与其所学专业并无必然联系。大学中文系尽管可以培养出大批卓有成就的文学学者专家,但后来成为诗人作家的(如郭小川、李瑛、贾平凹、苏童等)比例并不高。天益同志生于堪称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洛阳,文化积淀特厚,敬重知识文化的悠然古风,自然涵养了他的文艺素养。读中学时他未必没有当作家的幻想,只是后来的人生道路中断了他的学业也中断了他的作家梦。但喜爱读书与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却长期保持下来了,这就为他后来的散文创作作了充分的铺垫。天益同志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习惯:“遇上好文章,就剪下来存着,积到一定时候,再分门别类贴在一本旧杂志上,以供他日赏读。多少年来,汇集的各类文章已有数千篇,整整贴了二十多本。……所收之文品种多样,风格各异,正如端上餐桌的‘大杂烩’,却可都是颇可品味的佳肴。”(《塞上听潮》后记)这样,日积月累,使天益同志获得丰富的文学营养,加上他的多思、深思和勤于动笔的习惯,这就是他后来散文创作成功的秘